

盧溝橋事變前後日本對西部內蒙古政策之變化

◎ 丁曉杰

序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其大陸政策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東北三省及東部內蒙古相繼納入了日本的統治下。隨後，其侵略魔爪又伸向華北和內蒙古西部。在內蒙古西部，先以支持「蒙古獨立」，為誘餌，百般籠絡當時提倡蒙古自治的德王，終將其拉入自己懷抱，在日本的策劃下於1936年5月成立了「蒙古軍政府」，然後利用其作為向西擴張的工具。1936年「綏遠抗戰」，爆發，由關東軍援助的德王的「蒙古軍」一敗塗地，之後只得盤踞察北一隅，伺機待起。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相繼佔領了張家口、大同，「蒙古軍」配合日軍作戰，佔領了綏遠等地。德王等人以為綏遠已佔，以前日方曾許有佔領綏遠後幫助實現蒙古「獨立」之諾言，隨向日方提出蒙古「建國」要求。但此時日本面臨如何統治整個「蒙疆」地區的新形勢，從有利於統治整個蒙疆地區的目的出發，日本對其對蒙古政策作了調整，由煽動「蒙古獨立」開始轉向提倡「民族協和」。本文試通過份析日本在盧溝橋事變前後對蒙政策變化的原因，揭露其推行大陸政策的實質。

一 盧溝橋事變前關東軍煽動「蒙古獨立」，事變後開始提倡「民族協和」

以盧溝橋事變為界，關東軍的對西部內蒙古政策前後不同。事變前，為了向內蒙古西部擴張勢力，關東軍的一部分首腦及派駐西部內蒙古的特務機關人員，主張採用「謀略」方式，攏絡蒙古族的人心，打著援助蒙古獨立的旗號，竭力誘惑、籠絡德王等人，欲使之與其合作，企圖通過建立由關東軍控制的傀儡政權，達到侵佔內蒙古西部、繼續向西擴張的目的。為此，關東軍制訂了「內蒙工作」〔1〕ix·xiii¹計畫，其內容之一就是竭力籠絡德王等西部蒙古王公，向西部內蒙古滲透其勢力。當時德王由於領導的「內蒙古高度自治運動」受國民黨中央政府敷衍以及察哈爾、綏遠省方的壓迫排擠，遂將「復興蒙古」的目光轉向日本。在關東軍的拉攏誘惑下，1935年11月，德王等赴長春，與關東軍板參謀長板垣徵四郎達成了由關東軍支持、在內蒙西部「搞成一個獨立局面」的口頭協定。〔2〕(109)但當時這只是關東軍內一部分人的主張，並不代表日本軍方的意見。〔3〕(278)可是德王等卻把這當成了關東軍官方的意思而信以為真。

1936年2月在關東軍的援助下，德王等在烏珠穆沁右旗召開了「蒙古建國會議」，5月組建了「蒙古軍政府」，決定停止使用中華民國紀年，採用成吉思汗年號，公開走上了與日本「協力」的道路。德王等把「蒙古軍政府」看成是將來建立獨立蒙古國家的雛形。

1936年初，關東軍參謀部制訂了《對蒙(西北)施策要領》，欲將其勢力擴展到內蒙西部以西

的寧夏、甘肅、新疆等地區。第一步首先是控制西部內蒙古。為此、關東軍在上述綱中明確提出將內蒙西部從中國「分離」出去的口號。即作為華北分離運動的一部分，首先使西部內蒙古脫離中國政府，遂在此地扶植傀儡政權。為此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徵四郎等親赴綏遠，竭力拉攏時任綏遠省主席兼35軍軍長的傅作義，遭傅作義將軍嚴辭拒絕後，隨決定「將傅打倒或驅逐出省外。」〔1〕（514）

在關東軍的策劃及操縱下，1936年11月、以漢奸王英的「大漢義軍」做前衛，德王的蒙古軍為後衛，在關東軍的援助下，向綏遠發動進攻，此即綏遠抗戰之爆發。時經近一個月，結果德王的偽蒙古軍大敗，關東軍的「內蒙工作」計畫受挫。此後直到盧溝橋事變爆發為止，德王的「蒙古軍政府」只得盤踞察北一角。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日軍於9月至10月間相繼佔領了張家口、大同、歸綏、包頭等地。蒙古軍亦配合日軍行動，進駐了歸綏。關東軍原來計畫的通過「謀略」即通過利用德王的聲望和勢力來達到實際控制這一地區的計畫已成為多餘。對於日軍來講，張家口、大同是新佔領區，扶植漢奸實行傀儡統治即可，且所選漢奸皆為伏首貼耳之奴才，對日本主子的旨意不敢有半點違抗。但隨同日軍一道佔領綏遠的德王這時卻成了關東軍手中的一塊燙手的山芋。盧溝橋事變前為了利用德王，關東軍的一部分人，尤其是關東軍派駐內蒙西部的特務機關頭目田中隆吉等德王身邊的人，是以支持「蒙古獨立」為誘餌拉攏德王等人的。因此，日偽軍攻佔綏遠後，德王等認為「蒙古獨立」的時機到來，向關東軍提出了蒙古建國要求。但此時關東軍對西部內蒙古政策隨其佔領地的擴大已經開始發生變化。綜合考慮，關東軍不同意德王的蒙古獨立建國的要求，指示成立自治政府，德王對此耿耿於懷。〔2〕（186—187）

二 對蒙政策改變的原因

此時日本改變其對蒙政策的原因首先是針對新佔領地區的具體情況，從現實出發，為了有效地維持其殖民統治，開始大力提倡所謂「民族協和」；其次是為了防止偽滿洲國內已行「自治」的興安省蒙古族中出現離心傾向，日本認為不宜再提倡「蒙古獨立」；最後，權衡汪精衛偽政權與偽蒙疆政權之關係，從欲侵佔中國的「大局」出發，優先維護與汪精衛偽政權的關係，抑制德王等人的「蒙古獨立」要求。此外，從國際形勢來講，九·一八事變後，滿洲國未被國際社會承認，而且國際聯盟於1932年4—6月還在中國東北進行調查，確認九·一八事變是日本製造的，滿洲國是不合法的。日本拒不接受此報告，並於1933年宣布退出國際聯盟，在國際上處於極其孤立的地位。如果這時在搞出一個「蒙古國」，國際形勢對日本更加不利。

1 為了穩固新佔領地區的統治，開始提倡「民族協和」

盧溝橋事變後，關東軍在它親自出兵佔領了西部內蒙古之後，開始從新佔領地域的民族構成、經濟分布等實際情況出發，改變了以前一部分人主張的煽動「蒙古獨立」的對蒙政策，開始提倡所謂「民族協和」。

在後來被稱為「蒙疆」的地區，關東軍在37年9月至10月先後樹立起了察南、晉北、蒙古連盟三偽自治政權。但如何統治這一廣大地域，日本中央陸軍部、關東軍、以及日本華北駐屯軍之間意見不統一。中央軍部主張將以上三地區作為特別區納入華北偽政權的統轄之下，而關東軍則主張將三地域合併統治，建立「蒙疆」政權。²

由於這一地區是由關東軍出兵「親手打下的天下」，實際為關東軍所控制，因此這一地區的統治形式最後還是由它來說了算，陸軍中央部也不得不遷就關東軍的意見。關東軍竭力主張將三偽政權合併統治。陸軍中央部最後只得承認這一既成事實。³

關東軍佔領後來被稱為「蒙疆」的這一地區後，要求偽滿洲國政府派出顧問，以便對新佔領區實行「文治」統治，掩蓋其軍事佔領的事實。當時具體負責制訂對這一新佔領地區統治方針的是被稱作「滿洲國之王」的頗受時任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徵四郎青睞的關東軍參謀部第三課少佐參謀片倉衷。片倉衷作為關東軍對蒙政策的制訂者，一向反對蒙古獨立，因次選派派往新佔領地的最高顧問時，不是將日本人中的所謂「蒙古通」，而是把當時任偽滿洲國間島省(今吉林省延邊地區一作者注)省長、赴任前對蒙古問題幾乎是一無所知的金井章次選作最高顧問，將創建新政權的「重任」委托於他。片倉認為「察哈爾地區除漢人以外，還有蒙古人，本考慮派遣蒙古通，但又擔心他們過份偏向蒙古人，最後選擇了金井，並要金井到職後，就實地觀察應如何統治該地區一事向關東軍提出報告。」〔4〕(22)

金井到任後，通過實地調查，認為首先應將這三個偽政權合併統治，其次是提倡「民族協和。」

在樹立察南偽政權過程中，金井感覺到通過蒙古人控制純漢族地域弊害甚多，並拒絕了關東軍提出的要蒙古軍進駐張家口市區的提議，引起關東軍參謀們對他的不滿。〔4〕(30—31)

金井在建立晉北偽政權的過程中觀察到，晉北地區與山西省的其他部分聯繫並不密切，主要與京包鐵路沿線的張家口、綏遠一帶有著密切的經濟聯繫。並認為「將來，察南自治政府及綏遠的蒙古連盟自治政府與晉北自治政府一體化，成立統一的自治機構，建立在中國境內享有高度自治權的自治政權」最宜。〔4〕(45)

在視察綏遠的過程中，金井看到蒙古連盟自治政府內的寂寞情景，認為不是一個「新政府」成立時應該據有的景象。並通過與當地商會會長賀秉溫等人的接觸，由此斷定德王沒有得到漢族上層人物的支援，而該地區漢族人口又佔多數。〔4〕(49—50)

根據這些觀察，金井向關東軍建議：漢族、蒙古族、回族、滿族等多民族雜居的蒙疆地區應該作為一個整體來統治更為穩妥。〔4〕(53)

也就是說，隨著日軍的察哈爾、山西北部、綏遠等軍事佔領地域的擴大以及各地偽政權的建立，使關東軍的對蒙古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於是在聽取金井的建議的基礎上，計畫將上述察南、晉北、蒙古連盟三偽政權合併統治。為此片倉參謀9月下旬對上述地區進行了視察，與金井，德王等舉行了會談，與德王的會談中，針對德王提出的蒙古獨立要求，片倉衷強調「根據中央的方針以及關東軍的時局方策大綱，當前蒙古人所能得到的，只能象英聯邦內成員國那樣的自治，超過這一點實行完全獨立，不與外蒙合併是困難的，但成吉思汗年號及國旗等的使用不受影響。德王要求蒙古獨立的願望非常強烈，對我(片倉一作者)的解釋不滿。」〔3〕278—279

視察後片倉遵照關東軍的旨意起草了決定偽蒙疆地區命運的《蒙疆方面政治工作指導綱要》。該綱要規定將「蒙古軍政府」改組為「蒙古自治政府」；並決定在張家口設立統轄察南、晉北、蒙古三偽自治政府經濟事項的蒙疆聯合委員會，即首先從經濟上將此地區控制起來。決定對蒙疆實行廣域支配。〔5〕(120)

但是，合併統治這三個偽政權，隨之浮上的是民族問題。蒙疆地區內，察南、晉北地區，是純漢族居住區，即便是德王治下的蒙古連盟自治政府地域，漢族人口也佔絕大多數。

據1942年的統計，蒙疆地區1941年的人口總數是525,4833人，其中漢族501,9987人；蒙古族15,4203人；回族3,7748人；日本人3,3017人；朝鮮人、滿洲族各佔1萬，全部人口525萬的95%是漢族。蒙古族人口比例只佔人口總數的3%。居住在察南的蒙古人只有300人左右，晉北地區只有20人左右。〔6〕（73）那麼由此可以推測，偽蒙疆政權建立之初這一地區蒙古族的人口比例不會比1941多。

由於漢人無論在人口上還是在經濟勢力方面都佔絕對優勢，這種情況下，如果按照德王等人的要求建立蒙古國，樹立德王的絕對政治優越地位，必然會產生諸多矛盾，日本必須重新調整其在蒙疆地區的對蒙古政策。

於是根據金井的建議，關東軍從新佔領地區的民族構成、稅源等方面考慮，為了穩定當地的統治，放棄了過去關東軍內一部分人提倡的支持蒙古獨立的口號，明確規定為了懷柔在經濟及人口上佔絕對優勢的漢族，防止其他民族離心，必須提倡「民族協和」。〔7〕141—142

作為合併統治三個偽政權的第一步，1937年11月22日，首先成立了蒙疆聯合委員會，其下設立專門委員會，首先將金融、產業、交通等重要部門置於日本的控制之下。1938年8月、日本對該委員會進行機構改革，將幾個專門委員會改為總務、產業、財政、保安、民生、交通六部。進一步擴大和強化了「蒙疆聯合委員會」的組織與職權。其強化的程度，由協商性質的機構，變成行政組織。形成了蒙古、察南、晉北三個偽政權的太上機關，公然發號施令。〔2〕（78—79）這個「蒙疆聯合委員會」，就是後來的蒙古聯合自治政府的雛形。

2 防止偽滿洲國的「興安蒙古」出現離心傾向

九·一八事變後，關東軍最初曾鼓動、支持過東部的蒙古王公和蒙古知識青年的獨立運動，目的是攪亂當時的東北形勢，造成各族民眾都欲擺脫東北軍閥統治、尋求獨立的聲勢。為其發動的九·一八事變的「合理性」尋找藉口。但隨著「滿洲國」建國運動的展開，煽動蒙古獨立變得不符合日本統治東北的「五族共和」的國策，於是開始壓制獨立、提倡自治。

〔8〕94—105

因此，偽滿洲國成立後，在東部內蒙古設置了興安省，實行自治制度。其對蒙政策由最初的支持「蒙古獨立」，降格為只准實行「蒙古自治」。〔9〕（368）隨後，日本又在興安省實行改革，廢除了盟旗的封建制，各旗內增設日本人參事官，旗的行政完全處於日本人的監督之下。

由於興安省的實權掌握在日本人手中，提倡民族主義的蒙古族知識青年，對先支持後來又否定的日本對蒙古獨立運動出爾反爾的態度感到憤慨；而東蒙的封建王公們由於被剝奪了昔日的特權也非常不滿，東蒙上層及青年知識層對日本的蒙古政策皆有怨言。這種情況下，如果在西部內蒙古提倡蒙古獨立，或是建立獨立的蒙古國家，必然會使生活在「滿洲國」的蒙古人產生離心傾向，並且也不符合日本在「滿洲國」提倡的「五族共和」的口號，不利於滿洲國的「安定」。所以為了防止偽滿洲國已實行「自治」的興安省蒙古族中出現更大的離心傾向，日本認為不應該再提倡「蒙古獨立」。

3 優先維護與汪精衛偽政權的關係，抑制「蒙古獨立」

偽蒙疆政權成立之初，為了讓關東軍「專心」對蘇備戰；華北駐屯軍全力應付中國戰場，日本陸軍中央部決定在這兩軍之間「設立一獨立軍種，直屬天皇」。駐防蒙疆地區。於是1938年1月成立了「駐蒙兵團」，8月改為「駐蒙軍」。〔4〕（61—62）

駐蒙兵團成立時，在關於蒙疆政務的移交接收之際，關東軍司令植田兼吉對新任駐蒙兵團司令的蓮沼蕃講「蒙疆地方政治指導的根本是堅持民族協和、防共親日主義。考慮到諸般關係，尤其是考慮到將來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在目前蒙古連盟自治政府尚不具備實力的情勢下，鑒於進行蒙古獨立運動並無實際利益之現狀，應對其實行抑制……」〔5〕（176）即考慮到與將來要成立的偽中央政權的關係，日本對蒙古獨立運動採取抑制政策。

當時，在三個偽政權合併問題上，德王主張以蒙古連盟自治政府為基礎，取消蒙疆聯合委員會，吸收察南、晉北兩個偽政權，在厚和浩特（今呼和浩特）建立蒙古自治國。但日本軍部僅允許在蒙疆聯合委員會的基礎上成立蒙古聯合自治政府。〔2〕（89）

其實在德王醞釀主張成立蒙古自國之時，日本方面欲建立以汪精衛為首的偽中央政權工作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為了拉攏汪精衛、早日結束侵華戰爭，日本駐中國派遣軍計畫讓「國民政府」（汪精衛偽政權—作者）儘快「還都」南京。〔10〕154—56

眾所周知，當時國民政府行政院長汪精衛，由於與蔣介石的矛盾，於1938年12月18日離開重慶、潛飛昆明、於21日抵達河內。正好日本首相近發表了《中日兩國調整關係之基本政策》、即所謂「近衛三原則」。聲明立即得到在河內的汪精衛的回應。日本當局為了迅速解決中國問題，利用汪精衛打擊蔣介石，熱衷拉攏汪精衛。這樣就不得不在表面上表示「日本保全支那的領土和行政的完整並尊重其主權獨立，致力於修復日滿支新國交。」⁴即不再執行分割統治中國的政策，因此德王建立蒙古自治國的要求被擱置了起來。

即此時如果同意德王的建立蒙古自治國要求，勢必影響到日本與汪精衛的勾結。所以日本陸軍中央部考慮到汪精衛的立場，不同意設立「蒙古國自治國」。德王在其《自述》中曾談到「這時汪精衛可能與日寇有了秘密活動，日寇為了政治誘降蔣介石或實現利用汪精衛分割統治中國的陰謀和策略，蒙疆也就不能成『國』了，所以就變更了。」〔2〕（90）

這樣，日本從佔領中國的「戰略大局」出發，自然認為政治影響力和實力遠在德王之上的汪精衛的利用價值更大。汪精衛與德王比，當然德王處於從屬地位。所以，對歷來奉行實用主義的日本軍部來講，支持汪精衛、「委屈」德王，自在情理之中。在某種意義上講，德王及偽政權這時成了日本對中國全局戰略的「犧牲品」。

之後，日本在蒙疆聯合委員會的基礎上，為了更有效地對這三個偽政權進行監督統治，於1939年9月1日將三偽政權合併，成立了「蒙古聯合自治政府」。

1939年11月1日，日本興亞院會議決定在將來成立的「新中央政府（汪偽政權—作者注）承認蒙古聯合自治政府的高度防共之既成事實」。〔11〕（1）

1940年1月30日依據興亞院會議決定，駐華日軍召開青島會議。在汪精衛的南京偽國民政府成立前夕，將在日軍佔領地成立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中華民國維新政府」、蒙古聯合自治政府等偽政權頭子召集起來對蒙疆政權的政治地位進行事先商議。蒙疆方面由偽蒙古軍總司令李守信作為代表出席。會議之前，駐蒙軍事前已從日本陸軍省得到允許蒙疆「高度自治」的保證，所以會議上蒙疆政權承認汪偽政權為「繼承中國法統的合法政府」，汪偽

在日本壓力下不得已只好承認蒙疆的「特殊性」。^{〔12〕 320—21}

1940年3月30日，汪精衛偽「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11月30日，在南京簽訂了日、汪間的《日華基本條約》。根據此條約的秘密換文規定「鑒於蒙疆(含內長城線以北的地域)在前述規定下在國防上及經濟上具有成為日中兩國高度結合地帶的特殊性，基於現狀，承認其是具有廣泛自治權的高度自治區域。」^{〔13〕 (470)}此項條款的目的，是日本即排除汪偽政權對蒙疆地區的介入、又在一定程度上「安撫」德王之舉。

但此後德王的蒙古建國「熱情」「始終不減」，遇有機會就向日本提出，並由此與金井最高顧問及駐蒙軍當局矛盾很深、磨擦不斷。隨著日本侵華戰爭的長期化、其在人力物力方面漸感捉襟見肘，遂開始推行「以戰養戰」政策。為了掠奪「蒙疆」的重要戰略資源煤炭、鐵礦石及畜產資源，即為了使偽蒙疆政權最大限度地「協力」其侵略戰爭，開始不得不對德王等偽蒙疆政權的首腦進行敷衍、懷柔。於是，德王利用此「有利時機」與偽蒙疆政權的「政務院長」吳鶴齡密謀，作為「蒙古建國」的第一步，向日本興亞院蒙疆聯絡部和駐蒙軍方面提出成立「蒙古自治邦」的要求。恰逢此時希特勒發動侵蘇戰爭，日本軍部內一時「北進」的呼聲至囂塵上，因而位於「特殊防共地帶」的蒙疆也提高了身價。日本在很多事情上不得已只好遷就德王的主張。於是1941年8月偽蒙疆政權換上了「蒙古自治邦」的牌子。^{〔2〕 112—113}但日本興亞院會議為了避免與汪精衛偽政權產生磨擦，規定在對外宣傳上及對外公文中不使用的前提下，「默認蒙疆使用『自治邦』的名稱」。^{〔11〕 (2)}所以「政府改稱」時，既未舉行新政府成立的典禮儀式，也未大張旗鼓地開展對外宣傳。吳鶴齡的解釋是「第一步成立蒙古自治邦，第二步再謀求建國。並且『國』與『邦』在漢文上解釋雖有不同，但用蒙文翻譯過來，都叫『Ao Lao Si』(國家之意—作者注)對蒙古人也說得過去」。但德王「深感不甚愜意」。^{〔2〕 (113)}

三 結 語

九·一八事變後到盧溝橋事變前，日本對中國採取分割統治政策，在各地建立了一系列地方偽政權。作為其「華北工作」的一部分，制訂了「內蒙工作」計畫。為了向西部內蒙古擴張，關東軍中的一部分人，尤其是設在西部內蒙古各地的關東軍特務機關人員，打著復興蒙古、支持「蒙古獨立」的旗號，籠絡西部蒙古王公，以便順利推進其西擴張的侵略計畫。而關東軍首腦部對此採取聽之任之模稜兩可態度。其實日本政府及軍部從未制訂過復興蒙古、援助蒙古獨立的任何計畫。由於日本關東軍中這些人的個人的行為及言論，給蒙古王公們造成了日本政府或是軍部似乎支持蒙古獨立的印象。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日本侵略軍很快侵佔了原來打算通過「謀略」控制的西部內蒙古地區。這樣沒經過蒙古王公的「協力」即達到了進駐這一地區的目的，不用再像以前那樣打著支持「蒙古獨立」的旗號去百般籠絡他們，王公的利用價值大大縮小。即隨著關東軍的作戰地域範圍從盟旗地帶擴展到蒙漢雜居、漢族聚居地域，其對蒙古政策亦開始轉變。關東軍民族支配的重點逐漸從蒙古族向漢族偏移。關東軍接受金井顧問的建議，認為漢、蒙、回等多民族雜居的蒙疆地區必須作為一個統一體支配。因此關東軍及其後的駐蒙軍在盧溝橋事變後均拒絕了德王的蒙古獨立建國要求，竭力宣揚「民族協和」。

通過汪精衛偽政權來控制中國與利用德王支配蒙疆一隅、汪精衛與德王在日本政治天平上的砝碼孰輕孰重一目了然。所以日本為了扶植汪精衛，只好「犧牲」德王。因此自認為「與日

本合作在先，汪之投日再後」的德王，只得屈從日本的壓力，在自己做傀儡的同時，又兼做另一個日本傀儡的下屬。日本駐蒙軍雖然對德王的「蒙古建國」主張持否定態度，但若要維持「蒙疆」的所謂「特殊性」，又不得不抬出德王。因此，直到偽蒙疆政權垮台，日本不得不始終將德王捧為政府首腦。此外，為了防止已實行所謂「自治」的偽滿洲國東部內蒙古地區出現更大的離心傾向，也是日本方面改變其對蒙古政策的原因之一。

總之，戰前日本軍國主義的核心是為實現其大陸政策而不折手段地對外侵略擴張。為了擴張順利，有時也會打著諸如幫助「復興蒙古民族」等等各種各樣冠冕堂皇的幌子，但一切行動都以當時目前的現實利益為根本目的。其實這也真實地反映了日本軍部對外擴張的本性。本文所論述的盧溝橋事變前後日本的對西部蒙古政策的變化，可以說是對上述結論的一個極好的映證。

參考文獻

- (1) (日) 稻葉正夫等編·《現代史(8)日中戰爭(1)》〔Z〕·東京：美玲書房，1964。
- (2) (日) 森久男譯·德王自述〔M〕·東京：岩波書店，1994。
- (3) (日) 片倉衷·戰陣隨錄〔M〕·東京：經濟往來社，1972年。
- (4) (日) 金井章次·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蒙古警友會編·五原事件青史〔M〕·金澤(石川縣)：1986。
- (5) (日) 稻葉正夫等編·現代史資料(9)日中戰爭(2)〔Z〕·東京：美玲書房，1964。
- (6) (日) 蒙疆新聞社·《蒙疆年鑒》〔J〕·張家口：1942。
- (7) (日)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研究會編·走向太平洋戰爭的道路(4)日中戰爭(下)〔M〕·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
- (8) (日) 片倉進·備忘錄「內蒙古獨立運動史」〔J〕·滿洲與日本人編輯委員會編·季刊·滿洲與日本人·1977，(4) 94-102。
- (9) (日) 稻葉正夫編·《現代史資料(7)滿洲事變》〔Z〕·東京：美玲書房，1964。
- (10) (日) 秦鬱彥·汪兆銘工作·日中戰爭史〔M〕·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72。
- (11) (1)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圖書館·興亞院會議「關於中央政治會議指導要領等決定之件」，1939年11月4日·原資料簿冊號碼：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4—93—182。
- (11) (2)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圖書館·興亞院會議「關於蒙疆高度自治區域之件」，1941年4月5日·原資料的簿冊號碼：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6—63—86。
- (12) 劉映元編·內蒙文史資料第20輯，李守信自述〔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 (13) (日) 日本外務省編·「日華基本條約」·日本外交年表與主要文書〔M〕·東京：原書房，1978。

註釋

- 1 見拙文·1933-1936年關東軍內蒙工作評述〔J〕·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5)：56-59。
- 2 見拙文·日本合併統治蒙疆三偽政權內幕〔J〕·內蒙古師大學報(社哲版)，2005，(5)：10。
- 3 同上，11-12。
- 4 該資料通過<http://www.jacre.ga.jip/>從日本國立公文書館亞洲歷史資料中心提供的電

子化資料中獲得。原檔所藏機關為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支那派遣軍總參謀長板垣徵四郎陸軍省電「青島會談相關檔發送之件」1940年1月13日，其中的「關於日之新關係調整的具體原則」1939年12月。)原資料簿冊號碼：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5－10－105。

丁曉杰，日本下關市立大學非常勤講師。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五十六期 2006年11月30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五十六期(2006年11月30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